

# 文革的「第一張 馬列主義大字報」

• 印紅標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攻擊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大學黨委主要領導人宋碩、陸平、彭珮雲。6月1日，毛澤東決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自下而上衝擊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烈火。毛澤東盛讚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它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開始的標誌。

這張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人人皆知的，但是關於它的產生經過，卻長期存在着疑團，至今說法不一。在中國，最通常、最權威的說法是：這張大字報是由康生授意聶元梓等人寫成的<sup>①</sup>，「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康生一手策劃」，欺騙了毛澤東<sup>②</sup>。但是持這一說法的人沒有提供可供學者考察分析的詳細資料來源，有些人對此說表示懷疑。

為澄清問題，筆者翻閱有關的文字材料，收集了幾位知情人的口述資料。在聯名簽署大字報的七個人當中，筆者收集了聶元梓的口述資料，並直接訪問了其餘六個人，還以通信方式詢問了與此有關的1966年中共中央理論小組駐北京大學調查組成員張恩慈，得到了他的答覆。依據這些資料，特別是口述資料，筆者認為，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不是由康生授意，而是由聶元梓等人主動寫成的。大字報得到了曹軼歐和康生的支持。康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最後由毛澤東決定推向全國。本文將考訂和介紹有關這張大字報的歷史事實。

## 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七個署名者都是共產黨員，均來自哲學系，其中聶元梓是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其餘五人除了楊克明剛剛調出哲學系外，均為該系教員。一個系的黨組織領導人和

黨員為甚麼要攻擊學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領導？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講到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黨員內部、一部分黨員與學校黨委主要領導人之間存在着矛盾，這些最初並不十分嚴重的分歧和摩擦與政治運動相交織，逐漸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激化起來。關於這一點，雖然可能有不盡相同的評論，但是在歷史事實方面沒有重大的疑問。

1964年夏季至1966年初，北京大學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者「四清」）。運動經歷了反覆，牽動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激化了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4年夏季至1964年底。這一時期，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從政治上否定了北大黨委的工作，斷言北大黨委的方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方向，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帶頭指責學校黨委書記陸平等，一些青年教師按照左的錯誤觀點，響應社教工作組的號召，積極批判校黨委。校黨委節節敗退。北京大學黨委的上級領導機關北京市委竭力保護北大黨委，與社教工作隊進行抗爭，派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參加社教工作隊領導班子，派大學部辦公室主任彭珮雲到北京大學兼任黨委副書記，幫助北京大學黨委抗拒以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的進攻，但未能挽回局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園裏貼出炮轟北大黨委主要領導人的大字報。圖為當時一呼百應的情況。



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出現這樣一批積極份子並非偶然。運動前，哲學系部分教員就與校領導關係緊張。究其原因，據說涉及到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校黨委書記陸平對一批教員的「右傾錯誤」的批判，以及關於60年代初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的前任）工作作風的爭論。1962年，這位深受陸平器重的黨總支書記在哲學系黨總支改選中落選。本文無意討論其中的是非，只想指出黨內矛盾的存在。

從1965年1月至1966年1月是北大社教運動的第二階段。在這段時間裏，北京市委支持北大黨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扭轉了北大社教運動的方向。

1964年底，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方針。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並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一方面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面要求糾正前一階段社教運動中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鄧小平和彭真取代劉少奇負責社教運動的領導工作。

中央指導方針以及人事的變化立即導致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轉向。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接着，北京市委幫助陸平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此後不久，中央書記處決定撤銷張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隊隊長的職務，全面改組工作隊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接任隊長，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任副隊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戈華參加工作隊領導小組。此後，張磐石受到批評，離開北大。北京市委又召開北大的幹部和積極份子會議，統一認識，對追隨原工作隊方針的社教積極份子進行了批評。這次會議進行了大約半年，因其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所以被稱作「國際飯店會議」。1966年1月，北京大學社教運動宣布結束。這時毛澤東已經發動了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

北京大學前期社教運動的錯誤理應糾正，而聶元梓等人對於批評耿耿於懷，一直等待着為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翻案的機會。四個月之後，天翻地覆的變化到來了。

## 二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怎樣產生的？它與康生有甚麼關係？這是本文考察的重點。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批判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並且正式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傳達到了北京大學的幹部和黨員。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論小組派出以曹軼歐（康生的妻子）為首的調查組進駐北京大學。調查組的任務是調查北京大學的學術批判情況，實際目的是為整北京市委搜集資料，以及發動「左派」寫批判文章<sup>③</sup>。

在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第一階段，社教工作隊從政治上斷言北大黨委的方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方向。而第二階段，北京市委支持北大黨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1966年1月宣布北大社教結束。聶元梓等人一直等待着為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翻案的機會。四個月之後，天翻地覆的變化到來了。

根據當時擔任北京大學黨委委員、法律系系主任的陳守一回憶，調查組的曹軼歐不止一次找他詢問北京大學學術批判情況，並且說北京大學的學術批判有問題，鼓動陳守一「揭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北京市委領導，但是被陳守一拒絕<sup>④</sup>。

曹軼歐動員陳守一向校黨委發難未成，而哲學系的幾位中青年教師卻感到政治氣候的變化，躍躍欲試了。文革開始以後，這些社教運動的左派，密切關注着政治形勢的發展，時常聚在一起議論。「三家村」的落難和北京市委的危機會令他們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鄧拓正是北大社教後期工作隊領導人之一，對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着有可能對北大社教運動進行重新評價。

調查組進校不久，哲學系青年教員、社教後期受過批判的宋一秀、高雲鵬找到調查組成員張恩慈，談論北京大學的運動。張恩慈在社教運動時也是北大哲學系教員，運動前期的「左派」。運動結束以後，他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工作，這次隨調查組返回北大。張恩慈說，調查組到北大是為了調查學術批判情況。談到北大的運動，他說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有點死氣沉沉，法律系組織師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獄的歷史資料，埋頭故紙堆，方向不對。談到如何打開局面，張恩慈提議串聯左派。而宋一秀、高雲鵬說：「社教運動中的左派大多數被派到遠郊區搞社教運動去了，很難串聯，是否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之類的東西？」張恩慈也拿不准，沒有積極肯定，也沒有斷然否定，只是說「你們如果寫，也只能貼到黨委辦公室的門口」。意思是說，不能公開張貼。

在這前後，楊克明也見過張恩慈。楊克明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張恩慈的同事和朋友，社教運動前期的左派，剛剛從北大調到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楊克明說打算寫一份關於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申訴材料，請張恩慈遞送中央。張恩慈表示，現在向中央遞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過來，遞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楊克明打聽有關政治運動的消息，張恩慈說彭真確實已經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報》社、教育部已經有大字報了。

在這以後，大約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學系的幾位教員，楊克明、宋一秀、高雲鵬、趙正義和夏劍彖相約議論形勢。談話間，聶元梓來訪，也參加進來。幾個人談到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近來的報刊批判文章，認為社教運動後期北京市委、北大黨委批判他們時所依據的觀點，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風」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駁的觀點。北大黨委陸平、彭珮雲不久前傳達的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報告，強調學校黨組織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遵守紀律等，實際是壓制運動，北京大學運動的方向違背了中央的精神<sup>⑤</sup>。幾個青年人提議寫大字報，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聶元梓建議寫社教運動問題，但是年輕一些的教員主張要寫就寫現實問題，寫文化大革命。於是決定從宋碩報告入手，批判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

大字報由誰執筆？最初決定以趙正義的一篇現成批判稿為基礎，由宋一秀改寫。但是修改稿不理想，於是宋一秀重新起草，這是第二稿。接着，幾人又用大約兩個晚上討論修改文稿。討論中有人提議，問題應當提得更尖銳有力，鋒芒應當更犀利，要仿照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筆法，逐一駁斥對方觀點。因而推楊克明再作修改。

曹軼歐不止一次鼓動陳守一「揭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北京市委領導，但是被陳守一拒絕。哲學系青年教員找到調查組成員張恩慈，張提議串聯左派，並說彭真確實已經垮台了。大約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學系的幾位教員提議寫大字報，寫文化大革命。決定從宋碩報告入手，批判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

5月24日晚，楊克明在北京大學24樓112號房間高雲鵬的宿舍連夜趕寫。他對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幾乎是重寫，完稿時已是25日凌晨三、四點鐘。楊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給高雲鵬，就去電工所上班了。這是第三稿。

5月25日上午，高雲鵬、宋一秀、夏劍豸、趙正義和遲一步到達的聶元梓在北大24樓204號房間宋一秀的宿舍討論楊克明的修改稿，集體推敲，邊議邊改，逐句定稿。其中依照聶元梓提議修改了最後一段，並且加上三句口號：「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最後的定稿，由高雲鵬和夏劍豸各抄寫成一份大字報<sup>⑥</sup>。

大字報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甚麼？〉。文章通篇政治攻擊，其內容早已是眾所周知，這裏不再贅述。聶元梓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故第一個簽名。接下來是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當時不在場，由高雲鵬作主代簽。討論臨近結束時，趙正義去哲學系辦事，委托宋一秀代簽。再往下是高雲鵬。六個人簽完名以後，宋一秀叫來哲學系青年教師李醒塵，說明情況。李醒塵欣然簽上最後一個，即第七個名字。1966年5月25日下午兩點左右，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貼出。

以上敘述依據聶元梓以外的六個人的回憶<sup>⑦</sup>。他們強調，大字報是他們響應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所為，醞釀過程中向張恩慈打聽過消息，但是在貼大字報這一點上，沒有得到明確的支持，更談不上有人指使；實際上，大字報是由青年教師發起並執筆寫成的，聶元梓是參加者，而不是中心人物，沒有她的參加，大字報也會出台。張恩慈的回憶與這些教師的說法基本一致。

聶元梓的回憶也說大字報是楊克明等青年教員首先提議的，然而，她提出了一個其他人未曾涉及的關鍵性情節：大字報醞釀期間她見過康生的夫人、調

據聶元梓以外的六個人的回憶，大字報是他們響應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所為，沒有人指使；實際上，聶元梓不是中心人物，沒有她的參加，大字報也會出台。圖為聶元梓向學生演講。



查組組長曹軼歐，並且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

聶元梓說：楊克明提議寫大字報，她覺得不錯，但是考慮到要請示上級。與楊克明商議後，她通過張恩慈與曹軼歐取得聯繫。曹軼歐在調查組住地與她見面，當時還有楊克明、張恩慈和曹軼歐的一個秘書在場。聶元梓沒有提大字報要寫甚麼，只是問：「能不能給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貼大字報？」曹軼歐說：「能。」又說，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綱領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學習《五一六通知》。聶元梓回憶說，她和楊克明聽到曹軼歐的答覆後很高興，回到學校又告訴了其他人，他們也很受鼓舞<sup>⑧</sup>。

對於聶元梓所說面見曹軼歐一事，大字報的其他六位署名人士以及張恩慈無一例外地說不知道。楊克明和張恩慈對聶元梓稱會見時他們在座這一點，斷然否定，並且表示氣憤和無可奈何，他們說聶元梓在編造假話<sup>⑨</sup>。

對於相互衝突的回憶，筆者認為：聶元梓完全憑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很大，而其餘的人也沒有必要在近三十年裏串通一氣，否定事實<sup>⑩</sup>。比較大的可能性是：聶元梓見過曹軼歐，並且討回一個「能」寫大字報的「上級精神」，但是其他人沒有參與，也不知情。聶元梓與其他當事人的回憶雖然存在矛盾之處，但是都說明大字報的發起和醞釀是北大教師自主進行的，而不是康生或其他人指使的。

正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遭到反擊的時候，康生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報告了情況。毛澤東在6月1日中午見到大字報的內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求在電台廣播。毛澤東還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

### 三 毛澤東的決策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北京大學就出現了一千多張大字報，最初多為支持聶元梓的，但是維護校領導的大字報很快佔了上風。以後幾天，很多人指責聶元梓等人是反黨的大陰謀家，是鄧拓「三家村」的忠實衛士<sup>⑪</sup>。

5月25日，大字報貼出後幾小時，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來到北京大學。接着，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負責人張彥、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先後到北京大學，重申中央關於運動中貼大字報要「內外有別」的精神，傳達了周恩來的補充指示，要求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內外有別。北大黨委當夜緊急召開全校黨員大會，傳達中央和華北局領導的指示。領導人批評的着眼點是公開張貼大字報違背了「內外有別」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將大字報撕下來，或者用新的大字報將之覆蓋起來。他們雖然沒有反對貼大字報的形式，也沒有評論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內容，但這已經足以使大字報的作者陷入被動<sup>⑫</sup>。

調查組的張恩慈在大飯廳看到大字報，才知道這些昔日的同事有這麼一個舉動。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報的作者了解情況，索取了大字報的抄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壓力的楊克明問張恩慈：「我們寫的大字報到底有沒有問題？」很快，張恩慈打電話給楊克明，提出領他去見曹軼歐。兩人來到西頤賓館曹軼歐住處，曹軼歐看過大字報底稿以後表示，這張大字報沒有甚麼不對。她詢問了楊克明的年齡、工作，並對楊克明說這種事情要謹慎。大字報的底稿留

了在曹軼歐處，是楊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給其他人討論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聶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筆迹<sup>13</sup>。

正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遭到反擊的時候，康生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報告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情況<sup>14</sup>。毛澤東在6月1日中午見到大字報的內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求在電台廣播，並且寫了如下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破。」<sup>15</sup>當天下午四時，這個批示從杭州傳達到康生、陳伯達手中。毛澤東還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康生找了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他們按照毛澤東的精神寫一篇評論員文章<sup>16</sup>。

當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各地聯播節目中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內容。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篇評論員文章的重要之處是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毛澤東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於黨的組織紀律；號召人們打破原有紀律的約束，向任何反對毛澤東的人進攻，不論其職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

兩個月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到：「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同一天，毛澤東為這篇評論寫了如下一段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從這兩段文字不難看出毛澤東為甚麼如此看重並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他要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超越正常組織機構、制度、紀律的約束，衝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解決以往運動及常規運動方式沒有解決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講話：「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sup>17</sup>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正是提供了毛澤東所期待的，從基層發動群眾衝擊「走資派」的樣板，廣播這張大字報就是向全國推廣這種運動形式。事實表明，全國性自下而上衝擊當權派和學術權威的群眾運動狂潮，正是從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開端的。

毛澤東如此看重並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原因，是它提供了毛澤東所期待的，從基層發動群眾衝擊「走資派」的樣板，廣播這張大字報就是向全國推廣這種運動形式。全國性自下而上衝擊當權派和學術權威的群眾運動狂潮，正是從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開端的。

## 四 結 論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涉及三部分人：聶元梓等北京大學的幹部和教師、康生和他下屬的曹軼歐等人以及毛澤東。

這張大字報是由聶元梓等人發起，而不是受人指使寫成的。促使他們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在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在社

基層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動、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和決策，是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世的三步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群眾性樣板產生的模式。至於大字報貼出以後造成「天下大亂」，從根本上說，是由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戰略決定的，是作者們始料不及的。

教運動中被激化的北京大學黨內矛盾。聶元梓等人在社教運動中因為左的錯誤被批判以後不服氣，力圖翻案。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更廣大的社會政治背景。

第二，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號召。1966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已經傳達到基層並且被廣泛宣傳。在敏感的文化教育界，不少左派已經醞釀行動，例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的吳傳啟等人於5月23日貼出大字報，攻擊學部領導人楊述。教育部也有人寫了大字報。北京大學大字報是當時政治運動和思潮的產物，它在醞釀過程中也從調查組得到了信息和支持。

康生以及曹軼歐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促進和支持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sup>①</sup>。曹軼歐及其領導的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在大字報貼出前後對發起者表示了支持，這對促進大字報的出台和穩定作者們的信心至關重要。

第二，康生不失時機地向毛澤東呈報大字報的內容，對毛澤東及時了解大字報並進而決定支持大字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關於大字報的指示，最初也是通過康生傳達的。

曹軼歐確實在北大發動陳守一批判黨委，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康生策劃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不僅如此，根據王力回憶，康生對聶元梓的看法很不好，常在中央文革小組講聶元梓的壞話<sup>②</sup>。應當客觀地說，康生、曹軼歐促進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問世並且支持了它，但不曾策劃或者指使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也是決定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命運和歷史作用的人。北京大學對全國文化和政治具有傳統的影響，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示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毛澤東深知這一點，他盛讚大字報的真正動機，是把它當作發動群眾運動的重要步驟。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是針對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等人的，至於大字報貼出以後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成為「天下大亂」的起點，從根本上說，是由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戰略決定的，是作者們始料不及的。

基層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動、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和決策，是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世的三步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群眾性樣板產生的模式。

最後應當說明，本文是依據現有資料，特別是口述資料，對有關歷史事實的初步考察，相信隨着檔案文獻的公開以及資料的豐富，事實會得到進一步澄清。

### 註釋

- 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頁348。  
 ② 《北京日報》記者林浩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怎樣出籠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北京日報》，1981年1月9日。收入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第1卷（華夏出版社，1987）。這是記者對原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的訪問記，未提供詳細資料來源。



③⑩ 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講話中說：「關於我愛人(曹軼歐)的問題，是五月份，我愛人等五個人組成了一個調查小組，目的是調查彭真在學校搞了那些陰謀和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關係。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參考材料》，第32輯(1967)。當時康生為自己擺功勞，也只說是「促動」。關於調查組的任務，又見註②以及王力回憶。

④ 陳守一：〈歷史是公正的——北大教授憶「文革」〉，《中國研究》(香港)，1995年，秋季號。

⑤ 宋碩的報告是傳達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指示。華北局已經在5月11日進駐北京市委，彭真被停止了工作。見〈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刊於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北京黨史資料通訊》，1987年5月，增刊。

⑥ 據回憶，大字報原準備張貼在兩處。後來貼出的是高雲鵬抄寫的一份，因為第一張立即引起廣泛注意，夏劍豸抄寫的另一份就沒有貼出，事後被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為文物收藏。

⑦ 依據筆者1993年對宋一秀、高雲鵬、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1995年對李醒塵的訪談。

⑧ 根據聶元梓1994年7月的口述回憶。

⑨ 1995年楊克明得知聶元梓此說後，表示他根本沒有與聶元梓商議去找曹軼歐，更不知道有這麼一次會見。他說：「也許聶元梓自己去見過曹軼歐，但是為甚麼硬要說我在場呢？」張恩慈在1994年11月的回信中說，聶元梓稱通過他聯繫去見曹軼歐、同曹談話時他在場等等，都是聶元梓編造的假話。

⑩ 除聶元梓外，大字報的其他簽名者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現在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經退休。他們十分負責地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宋一秀說，在文革期間和文革以後他三次向上級寫材料、匯報或者交代大字報產生的經過，從來都是這樣如實講的，有案可查。而聶元梓1994年回憶中有不少明顯的歷史事實的錯誤，如把「中央理論小組」說成「中央文革小組」等，可能是誤記。她說她與曹軼歐見面的情況多年前在公安局時就已經講過。

⑪ 參看北京大學哲學系宋一秀等六人：〈搗毀北大「三家村」黑幫的反動堡壘〉，發表於《解放軍報》，1966年6月4日；北京大學工作組編：《大字報選編》(二)，1966年6月18日；以及大字報發起者在1993年的回憶。

⑫ 李雪峰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的講話，見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北京，1966)，頁667。又見註②。

⑬ 根據楊克明和張恩慈1993年的回憶。

⑭ 據王力回憶，陳伯達通過《光明日報》的內部簡報也將北京大學的情況稟報毛澤東。

⑮⑯ 據王力回憶。又據毛澤東1967年2月3日接見阿爾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毛澤東的批語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68)，頁30。

⑰ 轉引自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政治報告，《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

⑱ 王力還回憶說：「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吸收革命師生代表列席，江青提議安排聶元梓，康生提議楊克明，曹軼歐說大字報主要是楊克明寫的，結果彼此妥協，安排了聶、楊兩人列席。」王力說：「有人講大字報是曹軼歐組織的，這一點影子都沒有。」以上根據筆者對王力的訪問。王力的回憶亦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26-27；王力：〈「文革」第一年〉，刊於《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5期。